

# 郑观应近代经济思想的时代特点探论

杨华山

(华中师范大学 历史研究所,湖北 武汉 430079)

〔关键词〕经济思想;超前性;中西圆融

〔摘要〕郑观应的近代经济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西方先进文化和思想的引进,因此最终归结到了西方的资本主义实践,这本身就表现为对中国现实的超前。超前性一定意义上也就是与现实的冲突性:资本主义的近代经济在封建主义的政治体制之下不可能得到兴盛。西方经济思想和经营方式与中国古代的经济、理财思想是郑观应形成近代经济思想的两个重要出发点,郑观应的经济思想正是中西圆融的结晶。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00)04-0110-05

随着近代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启动,农业宗法社会传统的经济思想也开始向近代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思想变迁。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如王韬、薛福成、郑观应、陈炽、何启、胡礼垣等)的经济思想的近代性质已颇为鲜明,其中郑观应堪为典型。郑观应身兼近代早期著名的资产阶级改良思想家与近代企业家,其经济思想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平。正因如此,郑观应颇受学术界青睐,对其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商战”理念等研究较多,但对其经济思想的时代特点和个性特征,史学界尚无具体研究。郑观应经济思想具有政治功利、借鉴创新、思想超前、中西圆融等四大特点,前两个特点已有论述<sup>①</sup>,本文继续分析后两大特点,试图

由此进一步透视出近代中国早期思想演变轨迹及社会转型之一斑

## 一、超越与前瞻:现实冲突

人的思想产生于特定的社会现实,但另一方面,思想意识与时代环境并不总是同步的,或者落后于现实,或者超越于现实。这既取决于思想家个人的世界观,也取决于思想家认知事物的方法论。无论是滞后还是超前,如果过于悖离具体的社会条件和历史环境,都将与现实产生严重冲突。先进的思想同样源于实践,但却超越于实践。就当时的中国来说,虽说还不具备完整意义的资本主义经济,但郑观应的近代经济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西方先进文化和思想的引进,因此最终归结到了西方的资

〔收稿日期〕1999-11-15

〔作者简介〕杨华山(1965-)男,湖北大悟人,副教授,博士研究生,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本主义实践,而不是郑个人的主观臆造,这就本身就表现为对中国现实的超前——近代的经济思想对应于高度社会化大生产的资本主义经济环境。在郑观应时代,这种经济环境仅初具雏形,其后亦始终没有发育成熟,这就决定了郑观应的经济思想与历史现实的矛盾和冲突。超前性一定意义上也就是与现实的冲突性。当他揭露洋务企业的诸多弊端时,他是一个批判的现实主义者;当他提出自己的各种思想主张时,他又是一个超前的理想主义者。

对现实的批判和对西方经济的引进,这都为现实所不容。郑观应对洋务运动弊病的揭露和抨击本身就是对现实的不满;相应地,他提出的许多主张尽管是正确的,却很难顺利付诸实行。由于中国经济落后,工商不振,利权外失,郑对此深为痛心,他急切希望改变这种耻辱的局面,振兴工商,大力发展资本主义。而欲如此,势微力弱的工商界显然难以担此重任,政府对工商的提倡、保护和奖掖无疑起着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郑满腔热情,一再呼吁官商相通,官要扶助、抚恤和优惠工商,而不是勒索、暴虐和困挠工商。但现实却是无情的。封建主义的专制政府与资本主义的自由经济本来就是水火不容,郑却幻想二者能够水乳交融,共图振兴工商、富强国家之梦。严酷的现实一再粉碎了他的幻想。他看到的官大多是困商、虐商、病商的官,切身的经历和感受,使他对这些官的批判既深刻,又具体,说服力很强。

渴望振兴工商、挽回利权、发展民族经济的郑观应并不仅仅停留于口头的倡导,而总是脚踏实地、躬亲体行。不管是参与哪个洋务企业的创办或管理,他都行事严谨,勤于调查,善于发现问题和流弊,抓住关键,认真整顿和改革,尽量按照资本主义企业本身的经济规律和法则去经营和管理,

这必然遭到在封建方式之下受益人的反对和攻击。他任汉阳铁厂总办期间,事事要受督办盛宣怀的控制和约束,连职权范围内的用人也大受限制,即使钢铁的销路同样有人作梗。郑观应竭力降低成本,提高质量,以期与外国钢轨一争雌雄。然而,即使本国产品达到了洋货水平,仍不能保证其销路。郑任铁厂总办时就说过:“北洋前买外洋钢铁,价不廉于鄂,钢不胜于鄂,其时某局员必曰洋钢之胜,洋价之廉。大吏信之。”他如煤、铁矿等皆类此,“其故何哉?盖购于外洋,则用钱浮冒,一切皆可隐密;购于华官,则恐一旦漏泄,有碍局员左右辈之自私自利,是以大吏必为所蒙耳。”<sup>②</sup>由于认识的局限,郑观应对“大吏”常有某种程度的幻想。其实,在封建末世、清廷败落之际,能有几个真正的贤能督抚!况且,如若果其贤能,何以为局员所蒙?正是在这些自私自利的蠹虫——贪官污吏的把持和操纵之下,才使中国近代工商企业举步维艰,难以为继,幻想依靠他们振兴工商,无异于与虎谋皮。

郑观应提出大开门户,将中国边境省份开辟为“万国商场”。他说:“东三省、西藏各省,强邻时欲侵占,与其留为外人蚕食鲸吞,不若大开门户,凡与列强毗连之边境及琼、廉地方,均辟为万国公共商场,如有外人愿入我国籍者,准其杂居,招集公司开办各项实业,吸收外人财力,振兴我国农工,或藉彼合力以保疆土,免为外人侵夺。”<sup>③</sup>他在另外一封信中谈及同一设想,他说:“我国现在贫弱,民生计拙。中土路矿,外人覬覦,各思侵占,不如将边界之地开作万国商场,任外人懋迁有无,我收其捐税,贫民亦可得其工资。凡西人所到之埠,无不大营官室、广投资本,各国商人如均有产业自应公同保护矣。虽列强素存瓜分中土之心,然见我政策改良,推诚相待,又肯将边界开为

万国商场,或不致横生阻力。”<sup>④</sup>他设想将边境及琼廉沿海地方辟为万国公共商场的目的是主动开放市场,吸引列强投资,免于列强觊觎,于我既能保全领土,又能借力振兴农工,并能收其捐税,还能使我贫民得其工资,可谓一举多得。但其前提是万国商场的主权问题。郑很清楚,若主权不在我,开放门户只能是牺牲民族利益,故他强调:“惟最要者,须重定商律,收回治外法权,拟暂照日本律例颁行,华洋一律,毋许歧视。如是,则外人均受治于我法权之下,应无他虞。”<sup>⑤</sup>他也意识到他的这一主张肯定为顽固守旧派们所诟病。“如此犹有所虑者,则恐蚩蚩者氓,不明其中利益,尚多拘守,或演出土客不和之恶感耳。”因此他说必须“开导下愚”,使之理解和支持。<sup>⑥</sup>然而,这不仅仅是“下愚”的问题。

这一市场理论是郑观应经济思想与现实冲突的又一典型反应。首先,在霸权横行、弱肉强食的近代国际秩序中,资本主义列强根本不可能真心诚意帮助贫弱的中国发展工商事业。其次,衰败的晚清政府的封建性质决定了它无心亦无力担当领导中国于“主权在我”的前提下的主动开放、振兴民族经济的历史重任。再次,几千年的小农经济,长期的闭关自守、重本抑末政策的强韧束缚,使大多数人的小农意识、保守思想根深蒂固,暗昧于历史前进的方向,缺乏对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正确科学的态度,盲目排外的惯性传统与心理积淀非短时间可以“开导”转变过来(义和团的对外方式可谓最好的诠释)。郑观应对列强的设想未免天真,对清廷的企盼只能落空,对民众的认识则比较现实,也许这正是他只在与友人的通信中谈及此事而未公开论述的原因。

近代经济思想与现实的冲突诚然是郑观应个人的不幸,更是近代中国的悲哀。他晚年终于认识到冲突的根源在于政治:“政

治关系实业之盛衰,政治不改良,实业万难兴盛。查欧美政治革命,商人得参与政权,于是人民利益扩张,实业发达。可见有治人而后有法治,有治法必须有治人。”<sup>⑦</sup>他经营实业50余年,终于认识到“治人”与“治法”、“政治”与“实业”的辩证关系。资本主义的近代经济在封建主义的政治体制之下不可能得到兴盛。这是他个人的思想,也是整个中国近代历史的结论。

## 二、西化与回归:中西圆融

任何新的学说都“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源深藏在经济的事实中”<sup>⑧</sup>。中西对抗、中西文化的冲撞和交融,给任何一个生活于该时代的思想家提出了中西文化的评价问题。郑观应出身于一个封建地主的书香之家,自小接受了正统的儒家文化熏陶,但滨海的香山,近邻的澳门,国门的打开,家父的开明,欧风美雨渐有浸润,这铸就了郑观应的开放意识,使之容易接受新生事物,而非顽固守旧、盲目排外之辈。

郑观应经济思想的产生首先源于他的买办生涯,然后又在经营洋务企业的实践中进一步升华凝聚成较为系统的经济思想和理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初则学商战于外人,继则与外人商战”<sup>⑨</sup>。

1858年,郑观应来到了洋行林立的上海城,开始了他长达20余年的买办生涯。他的近代经济思想、政治思想等的形成正是以此为起点,并在此后的洋务实践中得到发展。

自林则徐、魏源首倡“师夷”始,尤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介绍和翻译欧美各国历史、地理、政治、经济等的书籍不断涌现。派遣留学、翻译西书、设立学堂本是洋务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京师同文馆和江南制造总局附设的翻译局翻译了大量西书,如《泰西新史揽要》《格致汇编》《万国公

法》,等等;同时,传教士及其他在华西人对西方的介绍和西学的传入亦相当可观,如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局外旁观论》以及花之安、李提摩太等的关于在中国推行“新政”的文章和书籍(如《自西徂东》等)。尤其是西方经济学说的传入对晚清社会近代经济思想的产生具有直接的催生作用。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曾在同文馆讲授“万国公法”和“富国策”(即政治经济学)课程,并翻译刊印了福塞特(H. Fawcett)的《富国策》(A Manual of Political Economy),海关总税务司还翻译出版了耶芳斯(W. S. Jevons)的《富国养民策》(Primer of Political Economy)。其他还有一些介绍评述西方财政、经济制度和思想的书籍,如《列国岁计政要》《保富述要》等。甲午战争后,西方近代学说和思想的传播更是发展到一个新的高潮。这些都为当时如同郑观应一样忧国伤时的先进知识分子所垂青,如郑观应十分喜欢阅读罗伯特(Mackenzie Robert)的《十九世纪史》(Nineteenth Century)中译本,以致于购买百册以赠友人。另外,传教士创办的报刊对传播西学也起了重要作用,郑观应即是《万国公报》的支援者和热心读者。频繁的社会活动,与外国人士的广泛交游,也是郑观应了解泰西的方式之一。

除了阅读中文报刊及翻译的书籍之外,他还可以直接阅读英文书报。郑观应十分重视英语学习,主张广译西书。直接阅读英文书籍和报纸也是他吸纳西学的一条途径。他自己说:“蒙向与中外达人哲士游,每于耳酣酒热之余,侧闻绪论,多关安危大计,且时阅中外日报所论安内攘外之道,有触于怀,随笔札记。”<sup>⑩</sup>在其《盛世危言》中,有很多附录、附论、节录等,大多是中外人士关于西方和时事的文章。他本人还著有实学方面的书(“曾与同事著有《万国电报通例》《测量浅不学》《电报新编》各

书”<sup>⑪</sup>)。郑观应的近代经济思想正是通过上述多条途径得以逐步形成和完善。

但是,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从小的儒家教育,中西文化的对比,使郑观应并没有走向历史虚无主义,而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持扬弃态度。中国古代的经济、理财思想是他形成近代经济思想的两个重要出发点之一。在其诗文中,他提到了《管子》《齐民要术》《农桑辑要》《农政全书》等与经济有关的著作以及管子、子贡、百里奚、弦高、吕不韦、汜胜之、桑弘羊、刘宴等农学家、理财家。他对管子尤为推崇,曾写有《读〈管子〉有感》一诗。该诗先略论富与强的辩证关系后吟道:“贤哉管夷吾,相齐知所务。武备固讲求,工商亦保护。”<sup>⑫</sup>由此可稍知他对中国传统经济、理财思想的借鉴与改造。

郑观应努力在中西学说之间寻求结合部和平衡点,力求融会二者。他认为,对西学的引进与吸收,离不开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和现实基础,“从事西文西学,固为知几之士,识时之杰,然必以我本国文字学问为始基,而后能融会中西之学,贯通中西之理。”他鄙视那些“略识洋文,略谙西语,便诋诃然夸耀于世,以为中国文字学问不足学,不必知”的“浮薄少年”<sup>⑬</sup>。在中西学的关系上,他说:“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要想与欧西争强,非徒在学其枪炮战舰,“强在学中国之学,而又学其所学也”<sup>⑭</sup>。早年他就认为洋务企业的各局总办应通中西之学,明制造之事。后来他建议朝廷增设商部,“以熟识商务,曾环游地球,兼通中西言语文字之大臣总司其事”<sup>⑮</sup>。这些都可看出其中西圆融的文化态度。他试图撷取中西学的优势,构建一种新的文化范式。蔡元培即认为《盛世危言》一书是“以西制为质,而集古籍及近世利病发挥之”<sup>⑯</sup>,此论颇中肯綮。

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毕竟与中国传统封

建主义相对立。一位外国史学家说,郑观应关于近代改革的理论和知识“不是通过阅读儒家经典获得的;而是作为一个买办同外国人交往的结果”<sup>①</sup>。——应该修正的是,买办生涯结束之后,他并没有断绝与外国人交往,对西学的吸纳,而儒家经典亦为郑观应所改造和利用。郑观应的近代经济思想当亦作如是观。用郑观应自己的诗句“熟读中外平准书”<sup>②</sup>来作为中西文化对其近代经济思想的双重影响的总结应该是较为公允和准确的。

由此可见,郑观应的近代经济思想是中西文化圆融的结晶。他对待中国的传统文化及经济思想,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冥顽自封;对待西方的近代文明及经济思想,既不盲目排斥,也不伪饰美化。这一立场和态度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走在了同时代人的前列。

近代中国早期的经济思想产生于当时特定的历史过渡时期,印染上了浓重的时代色彩;个人的经历学识、生活环境又使思想家的思想富有鲜明的个性特色。所以,郑观应近代经济思想的特点既属于他自己,也具有共性,因为“主要人物是一定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sup>③</sup>,反应了近代中国社会的过渡特质。

〔注 释〕

① 杨华山.论中国近代早期经济思想的时代特点——郑观应个案研究〔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9.

(4).

② 上海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A〕.夏东元.郑观应〔C〕.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214,211-212.

③④⑤⑥ 盛世危言后编:卷四〔M〕.郑观应集:下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414,422,414,414-415.

⑦ 盛世危言后编·自序〔A〕.郑观应集:下册〔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11.

⑧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6.

⑨ 盛世危言后编:卷八〔A〕.郑观应集:下册〔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620.

⑩ 盛世危言·自序〔A〕.郑观应集:上册〔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235.

⑪ 盛世危言·电报〔A〕.郑观应集:上册〔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66.

⑫ 读《管子》有感〔A〕.郑观应集:下册〔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1287.

⑬ 盛世危言·西学·附录“华人宜通西文说”〔A〕.郑观应集:上册〔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285.

⑭ 盛世危言·西学〔A〕.郑观应集:上册〔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276.

⑮ 盛世危言·商务〔A〕.郑观应集:上册〔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605-606.

⑯ 高平叔.蔡元培年谱〔M〕.北京:中华书局,1980.8.

⑰ Yen-Ping Hao. Zheng Guan-Ying: The Comparador as Reformer〔J〕.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November. 1969.

⑱ 商务叹〔A〕.郑观应集:下册〔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1370.

⑲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43.

【责任编辑:刘瑞弘】